【大钢论剑】

一旦充电标准统一了，特斯拉将会是一辆完全停不下来的交通神器。

特斯拉能否冲出“十面埋伏”

叶大钢

这一年，最火的莫过于特斯拉(Tesla)汽车了，有些产品的出现注定要引发历史性的变革。汽车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而电动汽车有可能改变整个汽车产业，特斯拉便是这次改革的推动者。

特斯拉汽车由美国人马丁·艾伯哈德2003年成立公司开始研发的，2008年第一款汽车正式下线，两年后便在纳斯达克上市，2013年市值达到120亿美元，2014年更是势不可挡。这样惊人的成绩让世人再一次对美国人刮目相看，之前当仁不让的是苹果。实际上电动汽车早已问世，而且在中国比亚迪公司的e6纯电动车早就量产并投入到市场了，德系汽车厂商的油电混合动力技术也是相当成熟，包括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汽车也卖得不错，而为什么只有特斯拉掀起了电动汽车的高潮？令人尤感惊奇的是，特斯拉是一家完全没有汽车制造血统的科技公司，创始人仅仅是个汽车爱好者。

面对特斯拉汽车的迅猛发展，想必各大汽车制造商早已坐如针毡，虽然特斯拉现在的势头不错，传统汽车制造商也深知自己的优势所在。奥迪、宝马等多家汽车制造商的纯电动汽车项目已提上日程，连中国的比亚迪都敢说颠覆特斯拉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那么传统汽车制造商做纯电动车到底有哪些优势呢？

在我看来，传统汽车制造商做纯电动车的优势有三点：第一，技术优势。特斯拉是一家没有技术沉淀的汽车制造公司，到目前为止专利总数不到150个，而传统汽车制造商的专利应该都是以万级计算的，如果做纯电动汽车有更大的发挥空间。第二，渠道优势。大多传统汽车制造商在全球都分布有自己的经销商，有完整而成熟的销售推广体系，一旦有新产品，线下扩张非常容易。第三，售后网络。对于汽车这个高频维护消费品来讲，售后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坚实的售后服务才能保证汽车使用的安全和便捷。

传统汽车制造商所具备的也正是特斯拉所担忧的，特斯拉与苹果不一样，一开始就很注重中国市场。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中国市场搞定了，全球市场就能迎刃而解。特斯拉似乎已经嗅到了自己身处“十面埋伏”，6月中旬宣布开放特斯拉的所有技术专利，宣称不会针对任何使用该公司专利的人发起诉讼，意味着其他汽车公司可以没有障碍地使用特斯拉的技术制造电动汽车。而这一招看似傻但实际却很聪明的做法，与谷歌的Android安卓手机系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开放的目的是让大家都使用，当使用的人多了便有了主动权。虽然特斯拉目前在续航里程和加速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而这些对于有百年历史的汽车制造商并不是不可超越的技术。聪明往往体现在预见性和逆向思维上，特斯拉便是这样做的。一旦使用特斯拉技术专利的公司多了，特斯拉自然会成为电动汽车的行业标准，那么冲出传统汽车制造商“包围”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充电桩一度成为特斯拉在中国发展的最大难题，虽然深圳是中国使用电动汽车最多，充电配比最高的城市，但是特斯拉却没有把深圳当作开拓中国市场的第一站。充电桩的配置、接口等在全球都各不相同，基本都无法满足特斯拉的充电需求，所以特斯拉渴求与宝马、奥迪等车商共建电动汽车充电标准，一旦充电标准统一了，特斯拉将会是一辆完全停不下来的交通神器。

特斯拉采用的核心城市加网络预订模式基本不亚于传统的汽车经销商模式的销售能力，而在售后服务方面也会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迎刃而解，电动汽车的维修要比燃油汽车简单得多，只要有足够的利润和前景，传统的汽修厂将会争先恐后做特斯拉汽车的特约售后服务商。

开放技术专利只是第一招，面对这场可预知的“战争”，特斯拉能否冲出重围，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互联网投资人)

【广深今谈】

将所有的公证权力固化于一个机构，必然产生各种弊病。

权力自肥的公证机构需要彻底变革

今纶

日前，广州市民冯先生到广州市公证处做网购证据保全公证，打印了13张材料的他竟被收费2000元。在询问收费依据半个月无果后，冯先生将此事在网络上进行曝光，广州市公证处在网上承认了违规并道歉。

围绕公证收费的新闻，其实近年来接连不断，基本都是直指高收费和公证人员的高收入。2013年1月，深圳市民马先生准备把妻子过世后留下的房产过户给女儿，结果被告知必须缴纳15000多元公证费用，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热议。同样是2013年，浙江温岭公证处主任被曝年薪超百万。

公证处是个很有意思的机构，一方面，它是事业机构，它掌握的权力所出示的证书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它又有自收自支的方便之处。这里面的漏洞其实很明显，在缺乏足够监督的前提下，把权力转化为金钱，简直是不得不走的道路，谁也不会傻到自我监督。至于收费标准，既然各地有相对的自主权，自然是“就高不就低”，所以经常出个“天价公证费”或者“天价打印费”的新闻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广州市公证处承认违规并道歉，这显然是不够的。冯先生是经正常程序，在公证处的办公空间里被索取高额收费，而且得到了单位开具的发票，这已经是单位行为了。作为旁观者和利益相关者，其实都想问一个问题：广州市公证处这么干有多长时间了？违规获利多少？这些获利都去了哪里？“对经办公证员暂停办证工作”也是远远不够的，根据以往经验，笔者大胆猜测：他不过是一个替罪羊而已。

当然，不仅仅是广州公证处存在这样的问题，整个公证行业其实需要一次彻头彻尾的自我革新与改变。

治本之策自然是公证权力垄断性的打破。在我看来，将所有的公证权力全部固化于一个机构，必然产生各种弊病，即使是要加强监督，那么监督的成本也会很高，这对于纳税人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划算的买卖。那么，如何在优质的服务和有限的投入之间取得平衡？唯有打破垄断。公证这件事有一定的法律专业性，完全可以公开招标，让律师事务所介入。公证的过程中涉及一些数据，也可以在采取安全措施的前提下，让获得授权的律师查阅，这些在国外早有现成的例子和经验，并不存在技术障碍。

在英国，法律规定的公证收费标准相对较低，公证人难以此为谋生的职业，更不用说获取高薪了，因此，通常是由社会信誉良好的律师兼职担任公证人，或由品德良好、德高望重但毫无法律背景的公民担任，还可以由法律规定某些官员，如治安法官、领事、军官和各级法院的官员执行公证人职务。当然，英国的法律体系和中国不同，不能完全照搬，但是其中一些技术细节与经验确实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打破垄断的改革必然改变目前公证处一家独大的霸王气概。只是相关部门到底有多大的决心要推动这样的改革呢？笔者不太乐观。事情的发展很可能是热闹一阵子，公证处表示道歉，然后过一段时间，公证处旧病复发，又开始“宰客”。因为土壤不变，病毒自然猖獗。

治标的办法就是重新设计收费标准，比如可以明确规定所有公证事务只能按照固定金额收费，例如某项目每次500元，取消所有按比例收费的项目。在此前的新闻中，屡屡出现因为房屋价值上涨，导致公证费动辄上万的情况，经常引发投诉。实事求是地说，公证的成本肯定没有这么高，公证机构有借机敛财的嫌疑。公证机构给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有渠道和权力的便利，如果利润过高，恐怕不合时宜。广州公证处的网站首页高悬“诚信、依法、客观、公正”八个大字，这八个字要落到实处，首先就要把收费标准降下来。当然，鉴于目前的客观现实，公证机构的运作需要一定经费，公证费用可以在成本价之上略有利润，比如5%~10%，但是这个成本和最终的收费都需要公示。这个办法虽然不能治本，但应该能遏制高收费的现象。

(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念念有余】

治疗中国的大城市病，需要解决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权力过大的问题。

京津冀一体化光靠市场没戏

余胜良

京津冀之间差异巨大，必须得政府实施“京津冀一体化”才能平衡起来。此前三地发展已经证明，光有市场，“京津冀一体化”就只是一个理想。

就在政府规划之外，市场在产业转移上一直没有缺席。河北很多地方政府想吸引北京企业落地，但根据专家们的观点，北京已经没有多少工业企业，北京产业的现状是服务业占优势地位，这些产业北京自然不会放，河北也不一定有能力承接。

北京的工业去了哪里？去了地租更便宜的地方。比如最近北京汽车集团就将新生产线放在河北黄骅，唐山市玉田县工业土地价格每亩不超过10万元，而北京市偏远地区也超过100万元，用地企业自然会算这笔账。

在北京工业产业转移中，最著名的当属首钢，当年有人大代表提出“保首钢，还是首都”的诘问，首钢钢铁主业转移到河北，自然是政府行政力的结果，但是首钢转移是早晚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首都环境承载力有限，更是因为首都土地价格越来越高，而钢铁业产值有限，地位没落了。

理论上讲，看不见的手将配置各种资源，缩小各地经济差距，比如现在很多沿海工业转向内地发展，许多企业家到内地投资，富士康到内地建厂就是案例之一。

但从现象上看，河北和北京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和两个地方的资源禀赋有关。北京拢聚了全国最好的资源，这和我国政治资源高度集中、权力集中有关，河北虽然包裹北京，却不过是一个普通省份。

这种近距离有时还变得很负面，河北精英人才、资本很容易被北京所吸引。所以有“灯下黑”之说。

资源嗅着金钱的味道集中，并跟着金钱而转移。赚钱能力更强的产业，是不愿意离开北京的。

有人总抱怨北京交通拥挤造成出行成本高，但是人们并未因拥堵离去，这背后的原因是，如果在外地，想办成某件事儿需要几天，仅来回北京就需要两天，这些地方不具备北京所具备的资源。

从北京到河北去，钢筋水泥变成了乡村、田野、水塘。河北靠着这些廉价土地，发展出中国最大的钢铁产能。在唐山，公路两边的田野里建了一座座炼钢厂，靠着这些炼钢厂又建起一座座加工厂。河北更适合工业发展。

正因如此，一些企业将生产放在河北，研发和办公放在北京，这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比如注册地在河北唐山玉田的同方国芯。北京有科研、人才、教育优势，河北无法比拟，而河北的劳动力和地租优势，也是北京所不具备的。

市场一方面让工业企业转向河北，另一方面又让全国资源向北京拢聚，包括河北的资源。但这种自然而然的配置，让北京越来越堵，京津冀差距越来越大。如今，是北京要依靠河北和天津，甩掉一些脂肪的时候了。

作为市场经济的信徒，笔者很不愿意让政府的手伸出来，哪怕一点点。但是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看得见的手如果不伸出来，一体化就只能是一个梦。

看得见的手正在起作用，比如在北京汽车产业转移中，政府政策就起了很大作用，北汽在北京市找不到地。这背后就是政府调控。如今，很多地方还将汽车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对象，北京市已经开始让汽车产业转移出去了。北京如今正在摸查企业，和河北省联合，欲将部分产业转移出去。

但往根子里一想，现在政府希望转移的，不过是根据市场调节迟早要转出去的，政府不过拾了市场的牙慧而已。光靠这些还不够，治疗中国的大城市病，需要解决资源过于集中的问题，还要解决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权力过大的问题——让权力去解决权力过大的问题可真有点难。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言无不劲】

社会的进步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往前走，人在其中，与时俱进。

“开酒不喝车”

李劲

2011年5月1日，国家颁布条例，酒后驾车由行政违法升级为刑事犯罪。那时候，酒国英雄还在醉意中浑然未觉，全国性的查酒驾就降临了。

我在深圳的朋友，有四人落入法网。最早的是卫生系统的小李。他在外面应酬，喝了一斤白酒三瓶啤酒，酒后，晃悠着开车回家，在侨香路被抓。警察请他下车，他说：“不用啦，谢谢你，我自己还能开。”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小李焦急地问看守的警察：“这是怎么回事儿？我要上班，我快迟到啦！”十五天后，小李回到单位。单位领导开会批评他，要他做检讨。小李激动地说：“我、我、我一定保证以后开车不喝酒开酒不喝车……”同事们哄堂大笑，领导也笑。春风化雨。那以后，小李戒了酒。其他三个酒驾落网的，情节不同，悲摧相似，在此按下不表。

除了不幸被抓的，也有侥幸逃脱的酒驾。我本人就侥幸过。一次，在深圳八卦路吃饭，喝了一杯啤酒；饭后，我沿八卦路右转红岭路，一转过来，就被警察拦住。警察要求吹酒精仪。我佯装着，对着酒精仪倒吸一口气。警察看了看，狐疑地命令：“你吹！”我鼓起腮，又吸一口气。警察恼了：“我让你吹，懂不懂？”我也没客气，猛吸一口气，说：“这就是吹！”后面塞着车，喇叭长鸣。警察问：“你到底喝没喝酒？”我说：“实话告诉你，半杯啤酒，还是饭前喝的，测不出来。”警察不耐烦地挥挥手：“快走快走！”这是2011年底的事。

到了2013年，我早就不再酒后开车了。傻子都知道，查酒驾不是一阵风，是“基本国策”。2011年，查酒驾的时间和地点都是有谱的，大家互相告诫，躲着走就可以了。有的警察抓到酒驾者，也会稍做通融。慢慢的，酒驾者少了，剩下的都是酒国英雄，或熟悉道路，或车技一流，或酒胆包天，或里面有“人”，不好抓。抓酒驾也就升了级，由原来的游戏版升为严肃版，明明是“抓醉猫”，却大而言之曰“猎虎”，把孙子的三十六计和打鬼子的游击战术都用上了。到了2014年，“猎虎”行动次数不多，但是，威慑力一刻也没有减弱。99%的人放弃了酒驾，这时候，代驾服务越来越方便、快捷、便宜了，实在没必要再冒风险。

2011年，刚开始查酒驾时，不少人抱怨这是吃饱了撑的，后来，人们渐渐理解并接受了。开始，人们东躲西藏，以费厄泼赖的精神应对之，如猫和老鼠的游戏，后来，渐渐严肃起来。

中国是一个刚上路的汽车大国，新手如云，30%的交通事故与饮酒有关，不严管怎么行？新加坡处罚酒驾，除拘留、吊证外，还有鞭刑。美国加州，警方可要求酒驾司机去殡仪馆，参观车祸死者的尸体解剖，如果酒驾酿成车祸致死，法院可以二级谋杀起诉，最高可判死刑。对酒驾惩处之严，举世皆然。

在汽车稀缺时代，警察上路查车，以证件、年检、发动机、车架号等为主：以查“车”为本；现在，情况变化了，车和证件不再是问题，于是，以查“人”为本了。喝酒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还不够，还要继续查：查安全带、查打电话、查是否及时更换轮胎（旧轮胎爆裂是酿成重大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这样，行车会越来越安全，将来的交通事故会不断减少。有了“安全”，还不够，还得查“文明”：礼让行车、礼让行人、不乱扔东西、保持汽车干净整洁等……别着急，一件件来吧。

社会的进步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往前走，人在其中，与时俱进。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松了不行，紧了也不行，不快不慢，由松变紧，渐入佳境，这就是上乘的治道……不管怎么样，请记住小李说的那句话：开酒不喝车！

(作者系深圳企业管理人士)